

毛泽东大典

沈阳出版社

毛泽东大典

(一)

生平·业绩·风范卷

沈阳出版社

(辽)新登字 12 号

毛泽东大典

生平·业绩·风范卷

廖盖隆 名誉主编 李峰华 主编

责任编辑:马宏伦 曹福志 葛君

封面设计:王岐

守哲

责任校对:张燕 李东训

版式设计:杜延祥

沈阳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 13 纬路 19 号)

全国各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印张:31.125 插页:4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000 千字

印数:1—3000

ISBN 7-5441-0001-4/A·1

定价:240.00 元(全套)

毛泽东大典总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廖盖隆 贾春峰

名誉主编 廖盖隆

主 编 李峰华

副 主 编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宏伦 王红续 柳 郑
秋 实 葛 君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世发 马宏伦 王红续
王充闻 李峰华 张毓茂
柳 郑 秋 实 高柏金
贾春峰 董万德 葛 君
廖盖隆

7.16/11

毛泽东大典各卷编辑委员会

生平·业绩·风范卷

主编 王红续

副主编 张 纵 孙慧荣 郁广宁 李志铭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红续 孙慧荣 龙润霞 李志铭

张 纵 邵其扬 郁广宁

编著者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 军 王红续 龙润霞 白洪文

孙慧荣 帅巧芳 刘月生 许 震

张有奎 张 劲 邵其扬 杨令军

郭 品 黄汇章 梁安柱 梁国昌

程福生 谭一青 谭湘兰 薄日安

思想·智慧·方法卷

主编 柳 郑

副主编 徐胜洪 彭恒军 陈 舟 季国平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刘玉芳 李聚山 陈 舟 季国平

柳 郑 徐胜洪 鲁世瑶 彭恒军

储士家

编著者 (按姓氏笔画为序)

牛辅恒	冯俊杰	刘 杰	刘玉芳
李玉钢	李聚山	李修忠	陈 舟
张 斌	张 晖	季国平	宋毅军
郁广宁	柳 郑	郑雅茹	高学栋
金庆军	徐胜洪	曹风月	鲁世瑶
彭恒军	储士家	戴茂林	

传播·研究·影响卷

主 编 李峰华

副主编 诗 韵 方 舟 仲 雄 王志业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文成	王志业	牛之杰	吕芳评
施凯鸣			

编著者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 宁	于 雷	王文成	王志业
王刚玉	田培坤	刘殿军	李峰华
杨一帆	杨鹤鸣	吴雪松	张雪浪
严 励	陈之明	金 英	金晓白
施 依	胡 凯	曹莉娅	彭 涛
谢东升			

《毛泽东大典》序

廖 盖 隆

读者看到《毛泽东大典》这书名，也许会觉得面生。觉得面生是不奇怪的，因为这样的书还没有出过。但它的含义是明白的，“大典”就是一部大书（典册是古代对书籍的称呼，因为古代的书是写在削好的竹片上，然后再用绳子串起来，捆成“典册”的）。明朝永乐年间就编纂过一部几千万字的百科全书式的类书，叫《永乐大典》。正在着手编纂的《中华大典》估计将收入古书两万种，共有 7 亿字。宋朝编纂的《册府元龟》（也有几千万字），也是书库中一部领头的书。《毛泽东大典》就是关于毛泽东的一部资料总汇性质的大书。这部书由《生平·业绩·风范》、《思想·智慧·方法》和《传播·研究·影响》三卷组成，共有 400 万字，字数比上述几部大书少得多。这个颇具特色的构架是由主编提出，经编委会讨论通过的。

这部书的主题很大、很重要，因为毛泽东是 20 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也是这个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之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即毛泽东思想，曾经指引占人类五分之一以上的中国人民经过 28 年的艰苦奋斗，在 1949 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随即开始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用和平的方式进行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在 1956 年就基本上完成了，因而使中国开始进入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此后，毛泽东还为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重要成果，为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虽然毛泽东晚年在探索中，犯了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左”倾错误，对党、对国家和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但是从他的一生看，他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而且他的这些过失从反面给了人们以深刻的教训，促使党和人民走上纠正“左”倾错误，并对从别国搬来的、弊端重重的社会主义旧模式进行根本的全面的改革的正确道路。因此，对于正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来说，再也没有比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伟大的但是也有错误的一生；学习和研究他的科学著作中得到集中体现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以他晚年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错误为鉴戒的更大、更重要的任务了。《毛泽东大典》的贡献，就在于它汇集了关于毛泽东的生平、业绩、风范，关于毛泽东的思想、智慧、方法，以及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海外的传播、研究、影响的最丰富和翔实的资料，以供我们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之用。

从 1920 年下半年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的革命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怎样分期，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我在 1982 年 5 月和美国中国问题学者施拉姆教授的一次交谈中，曾经说过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现在仍然认为这个看法是对的。我的看法就是：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革命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大体上可以分前期、中期和后期的三个时期来研究。

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革命活动的前期，是从 1920 年下半年到 1934 年年底的 15 年。这 15 年毛泽东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个期间，1927 年 7 月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前，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时期，这时，毛泽东已有了关于中国革命要经过以“实现人民统治”为目的的民主主义革命才能到达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从 1927 年 8 月到 1931 年期间，即土地革命前期，毛泽东思想（包括关于建党

建军思想和军事战略；关于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关于争取多数、反对少数的社会政策；关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开始形成。但当时，这个正确理论和路线还没有被全党所接受，特别是没有被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所接受，相反地先后受到了李立三和王明，特别是受到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排挤和反对，致使中央红军遭到第五次反“围剿”和长期的惨痛失败。但由于毛泽东在党内外的巨大威望，他仍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在他被排斥而让他“专做政府工作”的1932年到1934年间，毛泽东主要是发展了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建设的思想和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革命活动的鼎盛时期即中期，就是从1935年1月到1957年6月的23年。这是毛泽东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对中国革命作出伟大的辉煌的贡献的时期，这些同时也是对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重大贡献。这个时期的开始是1934年12月中旬到1935年1月中旬发生的中国革命从失败到胜利的一个历史性的转折。1934年11月下旬中央红军渡过湘江时遭到了重大损失，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12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准备围歼向湘西转移的红军，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的通道县城，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在通道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毛泽东提出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军比较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周恩来和与会多数领导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掌握着军事指挥实权的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坚持原议。15日，红军占领贵州省的黎平县城。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由周恩来决断，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周恩来后来回顾说：从黎平会议起，我们便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这就是党史、军史上著名的黎平转兵。于是红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黔北前进。12月底，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通过《关于渡江后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强渡乌江，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根据地。1月初，红军强渡乌江，7日红军占领遵义城。1月15日到17日，党在遵义举行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和纠正了“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决定由张闻天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起草《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由中央常委审定后下发；撤消长征开始时设立的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军事指挥三人团；红军由军委和红军总部指挥，而周恩来为党内受委任的对军事下最后决心者；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中常委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随后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军事指挥三人小组。从遵义会议以后起，正如邓小平所说，尽管毛泽东当时还不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主要负责人，但他在实际上在中央和中央军委起了领导作用。可见，历史性的转折是从黎平会议到遵义会议，而特别是在遵义会议时完成的。从这时起，红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又纠正了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随后经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迎来了全国抗日的伟大革命高潮。从那时以后，一方面，在实践上，经过八年抗战，取得了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抗日革命力量得到空前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在理论上，在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时期，即从1935年1月到1945年8月的十年多的时间内，毛泽东思想得到了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1945年8月到1949年10月）的四年间，毛泽东思想继续得到发展，指导党和人民取得了全国革命胜利，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头七年，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阶段得到新的发展，并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式的（即用和平方式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而且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同时还领导党和人民探索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建立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一个人在三四十年内（从1920年到1957年）对革命事业和革命理论作出了这么伟大的贡献，领导占人类五分之一以上的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在世界历史上是

罕见的。

毛泽东革命活动的后期或晚期，是从1957年7月到1976年9月他逝世时的19年。邓小平说：“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6月）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他又说：“从1957年起，我们的主要错误就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左”倾错误包括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的“两年徘徊”，使我们耽误了20年的时间。他还说：“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多少年来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他又说：“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

毛泽东晚期19年的领导，并不是全都错了，但这期间他的主要指导思想是错了，而且他的实际领导大部分时间也是错了，包括两次全国性错误。第一次是1958年到1960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倾”的错误，有三年时间；1961年到1966年5月爆发“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五年多，他领导党和人民为纠正错误、克服困难而斗争，他的实际领导又基本上是正确的，尽管在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他的“左”倾错误思想越来越发展，但是这些“左”的思想没有全部付诸实施，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毛泽东更大的一次全国性错误是发动和领导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10年“文化大革命”。但即使是在这10年间，毛泽东也不是全都错了。如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不仅他犯这个错误的主观愿望是好的（是想防止党变质、国改色），而且他还提出了一些好的思想，做了许多好事。例如他提出对外关系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和平的正确战略，打开了同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关系；他先后支持周恩来、邓小平的工作，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同周恩来一起机智地粉碎了林彪

集团，对江青的“四人小宗派”及其野心作了批评和揭露；对于冤假错案一经发现就加以纠正，他没有把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而交给了能联系许多老干部的、为人正直平实的华国锋，等等，这些都为后来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同志比较顺利地粉碎“四人帮”准备了条件，并从而保证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开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平稳过渡。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都充分了解，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并且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的正确的东西。”

毛泽东思想是 20 年代到 30 年代前期形成，30 年代后期到 40 年代前期达到成熟的；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它从形成到成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毛泽东思想中，在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建设；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和革命；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民内部矛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统一战线和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战略；关于党的建设等许多方面；都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俗话说，“旁观者清”。美国学者施拉姆在《马克思主义者毛泽

东》一文中说得好：毫无疑问，毛泽东对革命理论和实践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也可以肯定，毛泽东属于马克思主义者之列，因为他在他的思想中大量吸收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东西。如果说，像马克思主义这样重要和有影响的系统思想，是属于历史的，是由每个时代竭力追随马克思的人所创造出来的，那么，毛泽东应当可以算作我们时代的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之一。

施拉姆还深刻地指出，毛泽东是一个为人类的最终命运而操心和战斗的人，而且他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式道路”进行了有成效的探索，而反对照搬苏联模式。说毛泽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式道路”进行了有成效的探索，而反对照搬苏联模式是正确的，特别是在 1956 年苏共二十大暴露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严重弊病以后，毛泽东认识到苏联的工业化道路是“只要重工业，不要人民”（指忽视农业和轻工业）；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指出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指苏联）已经犯了沙文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就是对外的大国主义，对内的大民族主义，对人民的专制主义。”但是在探索中，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毛泽东和其他已去世的老一辈革命家都未能提出和解决实际上是从苏联搬来的权力过于集中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个关键问题；而正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和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 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完成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经过中共十二大到十三大和十四大，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成熟，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按照邓小平 1982 年 9 月在十二大开幕词中的解释，他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三大作出了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 21 世纪

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这 100 年左右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指出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邓小平在 1992 年春天南巡讲话中强调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 100 年，动摇不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指导我们的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指引我们在健康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胜利前进的伟大旗帜。

毛泽东思想有多方面的内容，但最珍贵的是贯穿于这个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它的立场、观点、方法，而它的立场、观点、方法的统一，就是毛泽东 1945 年 4 月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所概括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所产生的新的工作作风，主要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这三大作风，是保证中国共产党从历史的创造者广大人民群众中吸取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保证党的政治领导正确，从而保证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和胜利的基本方法。毛泽东在 1949 年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以及他在 1957 年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也有长远的普遍的价值。这些都是我们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始终遵循的。

这部书的第三卷所介绍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海外的传播、研究和影响，也是非常引人入胜的。据我所知，本卷所搜集的有关资料的全面和丰富的程度，也是超过前人的。无论是国内的或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视角和立论各异，都能启发我们的思考，帮助我们更多方面地更深刻地认识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深湛内容。

从这一切方面看来，《毛泽东大典》的出版是一件好事，值得我们欢迎。

凡例

第一卷凡例

- 一、第一卷为《生平·业绩·风范》卷，主要编撰汇集了毛泽东生平事业、个人生活及家世亲人等方面的资料。
- 二、以篇、章、节的体例统领本卷的全部内容。

三、本卷引用资料的出处主要以两种方式说明：1. 在文中注明作者及书名或文章题目；2. 在章或节后注明主要参考资料。这两种方式分别考虑了资料的性质及编著者的加工整理情况，也考虑到读者的需要。

第二卷凡例

- 一、第二卷为《思想·智慧·方法》卷，主要编撰汇集了国内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评述成果。

二、本卷按篇、章、节统领全部内容。按时间顺序汇集了国内学者研究毛泽东思想成果及争鸣观点，目的在于使读者在使用该卷时，既了解了毛泽东思想，又基本上掌握了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状况。

三、本卷资料来源及处理方法：本卷资料均来自国内公开出版的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专著、论文、报刊及杂志的有关文章。选用时，编者做了以下工作：1. 对原稿进行了疏理，使观点更鲜明、层次更清楚。2. 将原稿的注释一律去掉。3. 为了读者查找原文的方便，选用资料一般均注明原作者及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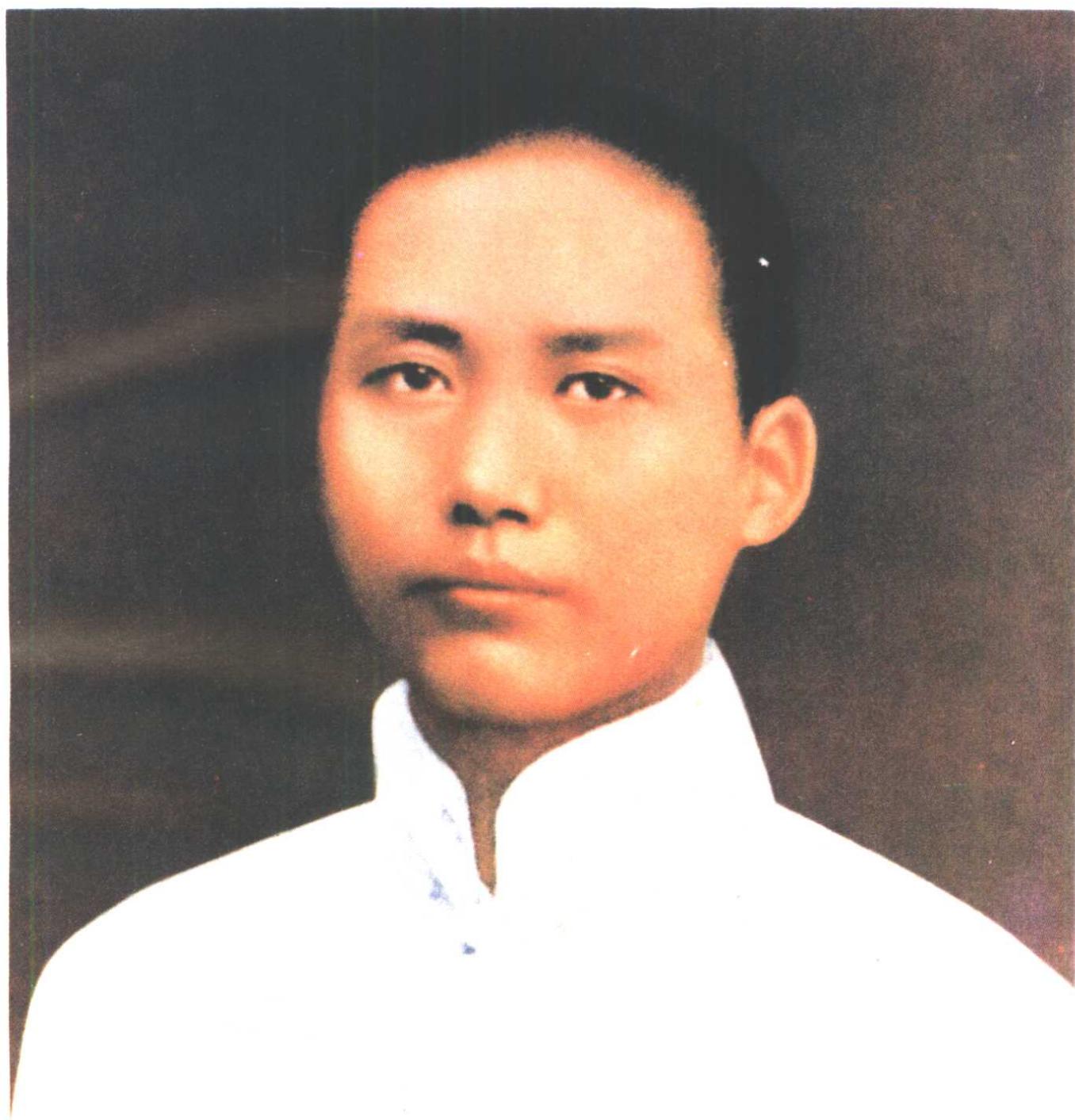
第三卷凡例

一、第三卷为《传播·研究·影响》卷，主要编撰汇集了毛泽东及其思想在海外传播、研究和影响的研究评述成果。

二、按篇、章、节统领本卷的全部内容。其中附录一、二“毛泽东生平大事记”、“毛泽东著作、电文、言论年表”按时间发展编排，这二份附录，编者参考了国内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文集、文稿，参考了国内理论界研究毛泽东生平、传记的现有资料。属研究工具类资料。

三、本卷编著内容的注释一律采用文内注。

四、为研究查找方便，本卷选用资料一般均注明原作者及原出处。



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